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研究
论丛

第 5 辑

IAE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evention Effect of
Participatory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Dynamic Perspective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
减贫防贫效应研究
——基于多维动态视角

郭君平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IAE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evention Effect of Participatory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Dynamic Perspective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 减贫防贫效应研究

——基于多维动态视角

郭君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减贫防贫效应研究：基于多维动态视角 / 郭君平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 5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论丛. 第5辑)
ISBN 978 - 7 - 5141 - 9138 - 7

I. ①参… II. ①郭… III. ①扶贫 - 研究 - 中国
IV. ①F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0496 号

责任编辑：齐伟娜 初少磊
责任校对：郑淑艳
责任印制：李 鹏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减贫防贫效应研究

——基于多维动态视角

郭君平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010 - 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箱：esp@ esp. com. 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cs. tmall. 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4.5 印张 220000 字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9138 - 7 定价：4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dbts@ esp. com. cn)



郭君平，江西吉安人，管理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现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近年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亚太地区“小农与扶贫”研讨会项目和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等，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世界银行项目、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及其他各级课题30余项；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及*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2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学术专著3部，参编6部著作；此外，在《光明日报》《农民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等发表评论性文章多篇。

本书在辨析、比较保障型扶贫、开发式扶贫和市场化扶贫等主要扶贫方式的基础上，着重从收入贫困、消费贫困、收入与消费流动性以及贫困脆弱性等视角，分别采用双重差分法、双重差分-分位数回归、Heckman两阶段法、负二项回归模型等国际主流计量分析方法，对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剖析和探讨，并结合主要研究内容和所得结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责任编辑：齐伟娜 初少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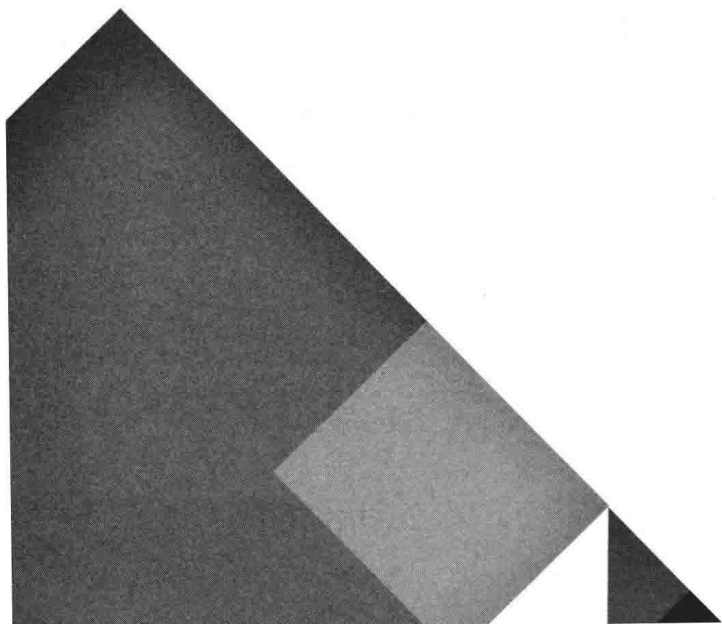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研究 论丛

第 5 辑

- 本书为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研究论丛编委会

主 任：袁龙江

常务副主任：毛世平

执行副主任：胡向东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任爱胜 孙东升 朱立志 李宁辉 李思经

李先德 吴敬学 赵芝俊 夏 英

减贫方式一直是世界各国在反贫困进程中最为关注的重要议题。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从扶贫方式的理论阐述、探索创新、调查反思、专题讨论到最优选择解析以及效益或效率评估，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层出不穷。当前，我国贫困地区面貌（如贫困人口、贫困面积及贫困程度）相比20世纪70年代末虽有较大改观，但影响低收入群体脱贫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却日益增多，贫困问题依然是非常尖锐、复杂、严峻的社会问题，并且不断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不仅如此，新时期扶贫工作还将面临经济增长减贫作用弱化、扶贫攻坚任务艰巨、农户贫困状态波动频繁、反贫困成本逐年提高、农村贫困向城镇转移以及失地农民贫困化、贫困老龄化、贫困女性化等诸多现实挑战。

作为一种减贫方式，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在中外已开展数十年，但只有极少数专家学者在揭示其运行机制和减贫绩效方面做了有益尝试，不过不够全面、深入甚或忽略了一些关键问题，如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为什么要实施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相比其他减贫方式，其高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有哪些，有何优势和局限性？对于当前农村多维贫困，其减贫作用机理又是怎样？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消费分层效应、动态减贫效应、精准防贫效应有多大？若推行此减贫方式，需从哪些方面着手以保障其有效性？上述问题的探讨和解答对我们深刻认识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意义重大。为此，本书基于中外文献资料，运用国际主流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剖析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以期进一步丰富、完善社区发展与贫困治理理论，并为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减

贫实践及相关制度安排提供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

经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书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是指以具备一定规模和长期发展条件（或资源禀赋）的农村贫困社区及其中弱势群体为基本瞄准单元，通过实施“一揽子”扶贫项目、援助活动或干预措施，达到多维有效减贫并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减贫方式，属于综合而非单一干预的“区域发展减贫模式”范畴。其主要优势包括：能最大限度满足穷人多方面需求；相对容易跨越社区发展的临界最小努力阈值；化解贫困表现形式多样化与扶贫项目单一化的矛盾；贫困瞄准精度相比片区、重点县更高。其局限性为：扶助社区须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和条件；内外资源整合成本高，统筹协调工作难度大；社区内农户受益不均，存在“溢出效应”和“漏出效应”；脱贫指标多，资金需求大，供需矛盾突出。此外，其减贫作用机理是通过农村生活类、生产类、社会类以及生态类基础设施建设的单一作用与协同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减少“生存型贫困”“温饱型贫困”和“发展型贫困”，同时，通过践行参与和赋权理念，减少农村社会排斥。

(2)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减贫方式虽有一定“漏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但其包容性较强，可惠及绝大多数“轻度贫困户”和“中、小农户”。除“极贫户”（最低收入组）和部分“极富户”（最高收入组）外，其间各收入组农户均能从中受益，且收入水平越高，相对受益越大。不仅如此，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此种减贫效果可持续性较强，无论即期效应抑或时滞效应均很明显，且后者远大于前者。此外，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农户参与种植、养殖以及本地务工等主要生计活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群体”和“时期”双重差异。

(3)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具有显著的动态减贫效应。在消费流动性维度上，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能显著降低农户陷入慢性消费贫困的概率（下降16.4%），其作用路径是使一部分农户从慢性消费贫困减缓至暂时性消费贫困，而另一部分农户从慢性消费贫困直接脱贫；在收入流动性维度上，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可明显降低农户陷入慢性收入贫困和暂时性收入贫困的概率（依序下降10.3%、2.9%），其减贫机理相对更复杂，除使部分农户从慢性收入贫困直接脱贫外，还使部分农户从慢性收入贫困先减缓



至暂时性收入贫困后再完全脱贫，余下其他农户则从暂时性收入贫困直接脱贫。

(4) 欠发达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 1999 ~ 2011 年期间降幅巨大 (约下降 99%)，抗风险冲击能力得到极大提升。总体上，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防贫”即期效应显著，可使农户贫困脆弱性指数降低 5 个百分点以上，然而其“防贫”时滞效应却并不突出。分不同群体考察，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防贫”虽存在一定“漏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但包容性较强、瞄准精度尚可，能惠及大多数“重度脆弱户”和“中度、轻度脆弱户”；换言之，除“微度脆弱户”“极度脆弱户”及部分“重度脆弱户”外，其间各贫困脆弱组农户均能从中得到保障，然而贫困脆弱性强度越高，所受保障程度越小。不仅如此，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此种“防贫”的精准度可持续性差，无明显时滞效应。

(5)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减缓消费贫困有显著的即期效应 (致使农户恩格尔系数下降 7.2 ~ 9.8 个百分点) 和滞后效应 (致使农户恩格尔系数下降 12.1 ~ 22.6 个百分点)，且后一种效应更大。不仅如此，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即期减贫精度不高、包容性较强，存在“溢出效应”，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缩小农户间恩格尔系数差距 (或消费贫富差距) 的功能，且对处于“脱贫率”分位点附近的农户恩格尔系数负向作用最大；及至后期，此减贫方式的“瞄准偏差”极大，仅能降低处于“小康率”分位点的农户恩格尔系数，“漏出效应”突出。

目 录

Content

第 1 章	绪论	1
	1.1 问题的提出 / 1	
	1.2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5	
	1.3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技术路线 / 12	
	1.4 创新点、不足及篇章安排 / 18	
第 2 章	农村社区扶贫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2
	2.1 核心概念的界定与厘清 / 22	
	2.2 基本理论依据 / 31	
	2.3 国内外文献回顾与述评 / 41	
第 3 章	中国农村社区扶贫实践及主要方式辨析	52
	3.1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的贫困表征 / 52	
	3.2 中国农村社区扶贫方式的辨析与比较 / 59	
第 4 章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减贫理论分析	78
	4.1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减贫的内涵与外延 / 78	
	4.2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减贫的作用机理 / 83	
	4.3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减贫的优势和局限性 / 88	
	4.4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减贫实施的必要性和前提条件 / 92	

第5章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潜在减贫效应

——基于比较静态分析法····· 96

5.1 农户收入、消费及生产性贫困特征 / 96

5.2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贫困深度、广度和强度的影响 / 109

5.3 本章小结 / 121

第6章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收入分配净效应

——基于收入贫困视角····· 122

6.1 问题的提出 / 122

6.2 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125

6.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129

6.4 拓展讨论：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与不同农户的生计活动 / 135

6.5 本章小结 / 137

第7章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消费分层净效应

——基于消费贫困视角····· 139

7.1 问题的提出 / 139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 141

7.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146

7.4 本章小结 / 153

第8章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动态减贫效应

——基于收入与消费流动性视角····· 155

8.1 引言 / 155

8.2 文献综述 / 157

8.3 研究设计 / 159

8.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163

8.5 本章小结 / 168

第9章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精准“防贫”效应

——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 170



9.1	引言 / 170	
9.2	文献综述 / 172	
9.3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174	
9.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180	
9.5	本章小结 / 189	
第 10 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91
10.1	全书研究结论 / 191	
10.2	宏微观政策建议 / 193	
	参考文献	201

第 1 章

绪 论

“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1 问题的提出

自人类社会告别蛮荒走向文明，贫困便成了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或社会问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不管在城镇抑或在乡村，都以不同形态、不同严重程度以及不同人口分布特征而为人们所关注。然而，贫困的概念内涵丰富，涉及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不同时代的人因视角或立场差异而对“贫困”见仁见智，即使置身于同一时代、相同国家和共同民族语言当中，人们在不同语境下对其含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过去数十年，贫困概念的演进虽受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然而伴随时间的推移，其变化逻辑具有明显的层次性、递进性和统一性，经历了从19世纪

末的侧重物质贫困（即从收入、消费角度定义贫困问题），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更多关注包括教育、健康、机会公平在内的可行能力贫困，再至 90 年代发展到包含社会剥夺与社会排斥等权利贫困在内的更为宽泛的贫困定义。

与贫困相对应，反贫困既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项长期重大课题，亦是人类对自身发动的一场旷日持久之战。当前，我国正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向全国人民展示前所未有的反贫决心与力度。回顾历史，中国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扶贫大致经过了五个阶段，即体制改革推动（1978~1985 年）、大规模开发（1986~1993 年）、重点扶贫攻坚（1994~2000 年）、巩固温饱成果（2001~2010 年）和多目标综合扶贫（2011~2020 年）。期间，各种扶贫惠农政策层出不穷，众多新颖扶贫模式竞相涌现，扶贫工作机制不断创新。单就扶贫模式或方式而言，从改革开放至今发生了诸多转变。例如，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开放式扶贫，单一或单向扶持→多元互动综合发展，分散式扶贫（重点县与贫困村）→集中连片跨域治理，政府主导扶贫→参与式扶贫，“一刀切”式扶贫（相同标准和措施）→差别化扶贫，等等。

尽管扶贫模式或方式千变万化、形式多样，然而，从扶贫环节和任务分解角度看，我国反贫困无论采取何种模式或方法都将面临“扶谁的贫”（瞄准扶贫对象）、“谁去扶贫”（明确扶贫主体）、“怎样扶贫”（指向致贫因素）、“扶贫投入”（引导社会参与）和“制度保障”（及时建章立制）五大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扶贫模式或方式的优劣，而扶贫效果的高低又基本取决于扶贫模式或方式的瞄准度、效率以及可持续性等。刘坚（2006）的统计研究表明，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减少 1350 万，90 年代年均减少 530 万，2002~2005 年平均每年仅减少 140 万，三个阶段减贫速度渐次递减。从 2011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以下简称《扶贫开发纲要》）颁布实施至 2012 年（期间以推行集中连片开发模式为主），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减贫速度攀升），脱贫效果明显，按新的农村扶贫标准，全国扶贫对象从 1.66 亿人减少至 9899 万人（占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相应下降了 2.5 个百分点），两年共减少 6700 万人，其中 2012 年减少了 2339 万人。



进而言之，从“往”至今，国内外被实践证明比较有效的扶贫方式或模式一般都存在时效性问题，即在某一阶段取得巨大或较大成就之后，总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趋势。对此，我国当前是执着探索长期持续有效的扶贫方式（可大范围推广），还是偏重因地因事制宜不断创新有针对性的短期扶贫方式（不具推广性或推广性较差），这是扶贫领域专家、学者和实践人员面临的且须孜孜求索的难题。

贵州是我国典型的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聚居省份，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黔之地，属喀斯特地貌，虽富集多种自然资源，但那里土地贫瘠、地理环境恶劣，历史上从建省到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贵州的贫穷面貌从未有大的改观，随着时间的更迭、推移，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尤其是与沿海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农民生活艰难、农业发展滞后、农村环境堪忧是贵州的基本省情和普遍现状，而贫困人口数量大、贫困覆盖面积广、贫困程度深以及贫困类型多样则是贵州山区的主要特征。及至目前，它仍是国内农村贫困问题最突出、扶贫攻坚最艰难的省份，其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均位列全国第一（属于新时期集中连片扶贫开发的主战场之一）。在2012年，贵州省的88个县（市、区）中，有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56.8%）。若按新的国家扶贫线（2300元）测算，2011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约有1149万人，占全省农村人口的33.4%，相较之前1274元标准下的418万人激增2.7倍，与一个欧洲发达国家（比利时）的人口数量相当。“发展慢”“长期贫困”“富饶的贫困”是贵州的基本省情，亦是国情专家、学者常称作的“贵州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世界银行、香港乐施会、美国福特基金会等国际或发达国家NGO组织就积极投入贵州农村反贫困实践，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机构除了提供物质、资金、技术等各种直接援助外，尤为可贵的是带来了全新的扶贫发展理念和先进的项目管理经验，并重视社区能力建设。

在此背景下，亚行贵州纳雍社区扶贫示范项目正是以上非政府机构与该省联合开展农村减贫项目中的一个经典案例。纳雍社区扶贫示范项目，是我国政府于1998年与亚行合作的技援项目（TA3150：支持中国农村扶贫项目的途径和方法研究）中“基础设施发展”分项目的一个研究性试点

项目，其目标是通过建设电力、饮水、灌溉、公路等小型基础设施，同时辅之以其他技术支持，来检验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减缓社区贫困的影响作用。项目实验地择定在纳雍县（国家贫困县）昆寨乡（极贫乡）的3个交通十分不便的“一类”贫困村。据统计，亚行对此扶贫示范项目共投入22.9万美元（在1999~2003年投入19.9万美元，2004年又追加3万美元用以新建千秋村大桥、千秋村进寨公路和农技服务中心），按当时汇率折算约188.8万元，再加上地方政府拨付的260万元配套资金（其中160万元用于果园开发），项目全程总投资达448.8万元。^①另从项目实施过程和效果来看，试点村充分赋权予农民并引导他们全程高密度参与，体现了参与式发展理念和方法。在短短数年时间，项目村发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变化，其经济发展水平早已从落后村跃居全乡前列，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也得到明显改善。可见，贵州纳雍社区扶贫示范项目的贡献不仅在于对社区减贫、农民增收和生活质量方面影响显著，而且在扶贫项目的设计方式、管理运作以及制度建设等层面对其他贫困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综上所述，作为我国现阶段众多扶贫方式或模式中的一种，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是以农村贫困社区为瞄准单位的综合而非单一措施或项目的减贫方式，除具有普遍共性之外，还有其自身特点。详言之，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是一种较整村推进外延更宽泛、内涵更丰富的新型反贫困治理结构或理念，是一项立足社区发展建设的系统工程。从国内地方实践看，它克服了以往扶贫运动中群众参与少、覆盖面窄、发展力度小等缺点，可满足社区群体尤其是贫困人口的多方面需求，而且更具包容性，能最大范围动员农村社区居民的力量，并充分尊重贫困农民的主体地位、意愿和智慧。但是，目前学术界对这种扶贫方式研究甚少，致使理论滞后正日益成为制约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全面铺开的突出问题，有鉴于此，本书试图就此作全面分析和探讨。

^①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贵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及纳雍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调查资料。